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教育与社会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从广义来说，教育总是经验的传递者，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教育就成为新生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生活的继承、发展的必需手段。通过教育和学习这种传递经验的方式，使人类经验日益丰富、不断扩展，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和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完善，教育成了人类社会永恒的范畴。学校诞生以后，人们日益重视教育与社会发展及人的身心发展的关系，认为教育有整合社会、凝聚群体、传播文化、改善政治、发展经济、造就人才及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并主张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受教育者的德、群、智、体、美诸方面施以影响，造就个性人格全面发展，具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至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员。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空前繁荣与融会的时代，是“百家争鸣”“诸子崛起”的伟大时代，也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文明突变时代，随着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之学的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诞生了一大批“思以其学易天下”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孔子、老子、墨子、子思、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这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在变革社会、改革教育的实践中，各自提出独特的教育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理论，比较系统地探究了教育与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问题，而其中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对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贡献尤为杰出。他们不愧是先秦时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在他们的倡导下，教育是立国、兴国、强国之本，能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观念，深入人心，影响后世，传播海外，从而使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始终沿着理性的、人文的、进取的、乐观的及笃实的精神方向发展。

理性的、人文的、进取的、乐观的和笃实的先秦儒家学派教育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曾为中国的价值系统的建构和完善起了桥梁作用，发掘先秦儒家学派教育哲学思想中价值资源，是复兴中国文化的一项课题，它将有助于具有文化性格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的创建。为了系统地了解和研究先秦儒家学派教育哲学思想体系，我们将就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论、智育与教学论、德育、群育、美育等方面进行阐述。下面，先从先秦儒家学派论教育与社会发展谈起。

一、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教育观

先秦儒家学派重视整体的动态的和谐，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理性与感性、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本来是相对待的，先秦儒家学派则追求于对待中求协调与统一，使之处于整体的、动态的和谐状态。用先秦儒家学派自身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德”、“内外合用”、“诚明合能”、“知行合体”、“美善相乐”、“仁智契合”的境界。和谐是整体的，所以，相对待

的诸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换的有机整体，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谐是动态的，所以，相对待的诸方面又处于矛盾、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生生之谓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刚柔相济而生变化”等等，都是揭示“生生日新，变化不息”的道理。将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观念贯彻于人生实践，则追求以人文精神以核心、以德、群、智美、体诸方面协调发展，以自强不息为动力的内在超越。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都是指此而言，“六艺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人生理想。将整体的动态的和谐观念应用于社会，则强调批判继承历史的文化价值体系，于综合中创新，用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凝聚群体，建构协调统一的社会秩序，结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与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同上），“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都是以社会安定、协调、和平、统一为宗旨。先秦儒家学派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教，“尽善尽美”之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政，都是以和谐为核心观念的人生

哲学、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先秦儒家的教育哲学的主要使命是将这种以“和谐”为内核的人生哲学（伦理哲学）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统一起来，贯彻于教育实践中去，造就个体人格全面发展的人，促进社会和谐地发展，实现由乱到治、由无道到有道的理想。研究先秦儒家学派教育和社会发展论，首先要把握住这一主导精神。因为在这种精神中体现了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原创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文化潮流相互激荡，彼生汇纳，惟有在相互激荡中方见文化的波澜壮阔，惟有在彼此汇纳中方见文化的气象万千。伟大的文化人应该有含弘阔大的心胸与深沉磅礴的思想，在学术上要有宽厚容让、兼容并包的精神，即如天之高明而涵盖一切之超越精神，如地之博厚而承持一切之持载精神，如大海的深邃宏博有容纳百川之精神，好学深思，综罗百代，汇纳群流，仁民爱物，化育人生，摄取各方面的文化滋养，创造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以回应“礼崩乐坏”、“道学将为天下裂”引起的种种危机的挑战。先秦诸子几乎都是“百科全书派式”的学术大师，他们的论著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道德、教育以及宗教学等等方面，内容浩瀚丰富、博大精深。同时，他们又各具独特的风格，各自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先秦文化作了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力求在综合地批判旧文化价值系统中创造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道术将为天下裂”，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由西周的“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到“学术下私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哲学的突破”是针对西周以至于商、夏的“王官之学”而出现的。在“王官之学”转变为“百家争

鸣”的古代文明进程中，大批有志于继承和创造文化价值系统的“士”崛起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仁义）为准则，在中国知识阶层崛起于历史舞台之际，贯注一种以“仁义”为灵魂的、以礼乐文化为血肉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骨架及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目标的理想主义，要求“士”能够超越个体与集团的利害得失，对人类社会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予以深厚的关怀。孔子、孟子和荀子之所以致力于变革社会，改善政治与改革教育的作用，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切实地实现这一理想。

导致社会变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大致与物质环境、人口、技术发明、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传播有关。先秦儒家学派的教育家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对导致社会变革的种种因素都有所发现、有所认识和有所研究，他们对自己置身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认识到在变革的时代为人们树立一个理性的、人文的、进取的、笃实的价值理想观念，将有助于从“道”的高度审视现实政治的种种变化而不被一时的权势争夺、风云变幻所迷惑。

孔子的“仁”就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是对“王官之学”的旧价值系统的最大突破。在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日益繁缛，脱离实际而流为虚伪的形式时，孔子将新的价值观念“仁”贯注于礼乐之中，使之焕然一新，并用以“仁”为内核的礼乐文化来化育政治、化育人生，实质上是文化价值系统的创造性转换。孔子仁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概括言之有十点：一、尊生健动，二、厚德载物，三、忧患意识，四、人道精神，五、主体精神，六、经世致用，七、和谐有序，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圣外王，九、人文化成，十、道尊于势。而内圣外王是仁学的核心理念，体现于政治、道德、社会、教育、文艺等领域之中。孟子的“仁政”,荀子的“尽伦尽制”的“王道”,《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等价值观念，可以说是孔子“仁”的精神的补充和发展。

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对春秋战国时代的鲁邹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的发掘、选择、综合和创造性的转换，是先秦诸子的共同使命，其目标是为了重新组合、构建适应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需要的新的社会文化体系，重建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相比较而言，先秦儒家学派更重视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导向机制、整合机制。他们根据以“仁”为内核、以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的价值系统来衡量现实政治、力求以价值系统的更新为轴心来变革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以“道”（仁义）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念，把每个人在感情上、意志上、信念上和理想上统合于一个整体，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理性与感性健全、和谐的发展，就是充分发挥了文化价值系统“导向机制”与“整合机制”的功能。孔子以前的政治家周公、管仲、子产、晏子等已经注意并进行了政治、经济的变革，力求通过政治、经济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开始把眼光移向人的道德。孔子重视文化价值系统的“导向机制”、“整合机制”，倡导“和而不同”的“损益”的精神把价值观念的更新作为人的更新和社会有机体的更新的前提，是上承周公、管仲、子产、晏婴下开春秋战国儒家学派及其他诸子之学的思想桥梁。

从西周到秦汉，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经历了

一个由初步统一到分裂割据再又回复到更高层次的、更完善的统一的历程。这种大变革兆兴于“殷周之际”，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奠定于周公摄政、“制礼作乐”之时，至平王东迁发生转变，晋国“作爱田”、“作州兵”，鲁宣公的“初税亩”，鲁成公的“作丘田”，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子产铸《刑书》，晋国铸刑鼎以至于诸子百家的崛起与秦汉统一天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物质文化层面到制度文化层面再到价值观念层面的演变过程。孔子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一方面吸取周公、管仲、子产等政治家改革政治、经济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一方面又顺应春秋时代变革的趋势，将视线转向研究人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问题，即由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转向精神文化及价值观念层面，仁学体系的建构就是这种转变的具体标志。经战国时代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的共同努力，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得以初步完成，而“和谐”的精神，则是其内核。立于人文本位讲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及人的心灵等方面的和谐，教育的使命与功能以追求与增进和谐为宗旨，“和为贵”、“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人合德”的宇宙体论、内外合用的理想政治哲学、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都以教育作为中介而共同发挥着更新人的价值观念和造就个体人格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作用。“仁义”成了一个人的根本价值准则，“大同”成为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不是在“上帝之城”和“西方净土”去寻求人类的幸福，而是在真切的人世去落实“仁”的理想。这种站在人文立场上去追求人生价值的教育哲学思想，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民心的凝聚、社会秩序的建构，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理解这点，我们就可以把握先秦儒家学派以“和谐”为内核的教育与社会发展论的精神实质。

教育有传播文化价值观念的功能，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的选择、整理、传递及更新，不同系统的文化的吸取和融合，以至于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在综合过程中的创造，都与教育这一功能密切关联。同时，教育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又可以充分发挥文化价值观念“导向”和“整合”的机制。先秦儒家的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等面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互相对立的理想的冲突，想从变革教育入手来达到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的目的，帮助一个人在相互冲突的人生理想中做出符合“道”的选择，确定“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和“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孟子所说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尚志”，“仁义而已矣”，就是启导人们不应被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所迷惑而做出理智的抉择。

从周到秦汉的历史发展趋势分析，先秦儒家学派倡导的“仁义”“仁民爱物”“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把当时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建成为一个境界更高的世界。尽管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儒学大师为实现“道”的理想所作的努力受到种种挫折，但他们在“造次颠沛”的磨难中仍然未放弃仁道理想。经济史专家胡寄窗说：“孔子在人类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可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相比拟。就他的思想影响的宏大而言，是可以这样讲的。如就他的政治作用而言，又当别论。单从政治上已起过实际作用特别对未来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衡量，释迦牟尼等三人远不能与孔子相比拟。”①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发展到矛盾交织、充满危机的阶段，视野广阔、理想高远并能引导社会前进的思想就会诞生。以孔

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仁”、“大同”、“仁民爱物”的价值观念是应时代的运转而形成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界限与民族界限的哲学观念，不仅中国学者这样理解，就是西方世界的哲人也有同感。犹如苏格拉底成了“牛虻”,孔子则成了“木铎”,他们虽然在现实政治上无法把当时社会由“乱”、“无序”再变为“治”、“有序”，但他们关于由乱转治，由无序变有序的思路，并由此而做的哲学反思，给后人以无穷的启示。

太史公说：“世异变，成功大。”春秋战国的大变动不只是表面的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其中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动力，发而为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先秦儒家学派的“仁义”、“仁民爱物”、“人文以化成天下”、“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主导部分或主流。《礼记·礼运》说：

>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庸》也说：

>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秦儒家重视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向”与“整合”功能，与当时崛起的“士”“思以其学易天下”的思潮有关。处于战争频繁、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都有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略和谋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淮南子·汜论》篇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与墨、道、名、法相比较，以人生哲学或伦理哲学为基础，以礼乐文化化育人生和政治与以追求社会秩序协调和谐发展目标的儒家学派的政治哲学，尽管被统治者或其他学派批判为“不识时务”、“迂阔”，但其置身高远的人文理想，站在道德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层面，对“苛政”、“暴政”、“民贼”、“独夫”进行猛烈的抨击，不为一家一姓的兴盛而为“天下为公”等精神，为后世的儒家学派教育家、政治家树立了一个“道尊于势”的优良传统。从孔子、孟子将“仁义”精神贯注于“道”之中并明确提出“士志于道”的人生方向之后，自从曾子教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之后，历代卓越的教育家、政治家几乎都坚持“道尊于势”这一优良传统。

秦汉以后，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几乎都关注教育，而教育家也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他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的精神，可以说是对先秦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和发扬。康有为在《孟子微·自序》中写道：“孟子之义，岂不殊尤显微哉！乃仅知其介介之义，而不知其肫肫之仁；仅知证其直指之心，而不知推其公同之理。不窥其门，不测其涯，土尽割地，因皆失日，冥沉黑暗，邈邈数千

年。嗟哉！吾昔滋惧。窃不自量，发其微言，宣其大义；择其篇章，类而聚之。俾彰彻大明。庶几孔子大同之仁，太平之义光明于大地，利泽于生民，其兹孟子之志欤！”康有为主张发掘先秦儒家以仁义为内核、以大同为理想的政治哲学资源，吸取西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精神，为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历程中获得创造性的转换，可以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尊于势”的精神创造性的发挥。先秦儒家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对中国历史与人类未来世界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二、“先富后教”为内核的群育观

先秦儒家学派深受春秋以来“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的观念的影响，形成“仁民爱物”、“富民教民”的民本思想，他们怀抱“救民于水火”、“将以斯道觉斯民”的志向，以“足食、足兵、民信”为立国的三大策略，在强调以“道”（仁义）为内核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向、整合功能的前提下，尤其关切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庶”、“富”、“教”是孔子仁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荀子继承了这一精神而加以扩展之，形成“与民偕乐”、“制民之产”、“民可使富”、“尊贤重教”（《孟子》）与“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开源节流”、“上下俱富”（《荀子》）的观点，对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教育与国计民生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了新的阐述。

孔子所理解的“道”（仁义），不是高悬于空中的东西，而是落实于日常现实人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的，所谓平铺地人文世界或人间性。孔子所理想的“修己以安百姓”、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精神价值的导向直接联系着现实生活。教育要发挥促进个体人格全面发展和社会秩序和谐发展的功能，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民众的素质和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仁政德治”的坚实基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先秦儒家把教育列于社会由乱转治、由无序变有序的战略重点，从改革教育入手推动社会变革的战略，是孔子及其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最具特色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家的影响颇深。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是孔子教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即把人口、财富和教育作为立国的三大基本要素，以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为目标的观念。“庶”是人口众多，“富”是物质生活丰富，“教”是“教化”或以人文精神化成天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提高民众的素质，是谋求社会秩序和谐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是解决因分裂、动乱、战争和暴政所造成的种种危机，重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重要途径。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发展教育都是针对民众说的，是孔子“仁民”、“爱民”、“惠民”、“教民”的“德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的另一种表述。这种思想上承管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下开孟子“仁政”以“民可使富也”、“教以人伦”为基础及荀子“王道”以“富国裕民”、“导之以礼乐”为根本的思想的先河，并对后世儒家学派的教育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问题，是教育家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人口增

长数量、质量、速度都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人口增长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水平的高低，是引起社会动乱或社会安宁的直接原因之一。孔子将“庶”、“富”、“教”三者联系起来考察，确实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社会学观点。孔子生于“民散久矣”(《论语·子张》)的动乱时代，胸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近者悦，远者来”，“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的政治抱负，把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富民）和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质（教之）作为实现“仁”的主要途径，进而达到凝聚、团结群体和整合、重建社会使之和谐发展的目的。这种以谋求人民幸福和社会安定为宗旨的观点，与老子“小国寡民”、“常使民无知无欲”，“绝学无忧”，“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人口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繁殖和列国诸侯实施奖励政策。频繁的兼并战争，耗掉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各国诸侯都热衷于发展生产、增加人口和扩大税源。“足食”，“足兵”，“富国裕民”等立国大策，也是在这种现实状况而形成的。《孟子·公孙丑上》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人口的多寡、土地的广狭，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推行仁政也要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根本策略，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眼光之所以超越时代和超过一般的政治家，就在于他们对关乎人口质量的德、群、智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改革方案，实施“有教无类”、“先富后教”的理论。朱熹阐释孔子

“庶、富、教”的思想说：“庶，众也。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四书集注》）康有为也说：“庶，众也。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民德不育。富以养其生，教以善其性，二者备矣。夫教化废，则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行，则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然饥寒切肤，不顾廉耻，孔子虽重教化而以富民为先。管子所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盖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论语注》）从朱熹和康有为的注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孔子“庶、富、教”的思想，实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识远见。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子路》“子适卫，冉子仆”条后面，紧接着的是“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是因卫灵公不用慨然长叹之词，寓意是多么深刻。透过孔子长叹之语的背后，可以窥见这种大教育观的经世精神。

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与“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治国战略，孟子将这一战略纳于自己的仁政理论之中，强调施行仁政，首先要推行的纲目就是“先富后教”。他说：

>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将“道”(仁义)与“富民”、“教民”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处处替民众着想，使孔子“庶、富、教”的民本精神系统化，形成完备的仁政理论。“道”的导向和整合机制必须落实于“富民”、“教民”的现实政策之中，没有“道”的导向，就不能处理好“富民”与“强国强兵”的关系，甚至会横征暴敛，“率兽以食人”，造成一方面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另一方面则“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两极分化现象，同理，没有“道”的导向，“教”也会迷失方向。不明仁义之道，不辩义利之理，不识“民贵君轻”之义，不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之势，就会为一己之私利而忽视天下之大公。反之，没有具体的“富民”、“教民”的措施，“道”(仁义)也无法实现，“道”不是悬空的抽象概念，而是与国计民生血肉相关的具体真理。孟子的“仁政”理论，以“民本”为灵魂，以“性善”为基础，以“富民”、“教民”为血肉，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为骨架，以“深造之以道”、“养浩然之气”为动力，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目标，是一个宏大而切近的人生实践或政治实践准则。至此，春秋时期形成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已发展为完整的仁政理论。这种以调护、安顿、弘畅生命为内核的仁学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精神基质。

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经孟子的进一步发挥有了新的

突破，在孟子“仁政”学说中，教育的地位是崇高的。施行仁政，以“制民之产”为基础，以发展教育为先导，其要旨诚如康有为所说的“此言富民民自仁，即富而后教之义”（《孟子微》）。荀子虽然写了《非十二子》与《性恶》，对孟子的人性论及五常说进行了批判，但其重视“富民”、“教民”的程度，并不亚于孟子，只不过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局势，对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做了修正、补充以至改造罢了。同孟子相比较，孟子侧重于内圣之学，其贡献主要在仁的方面，而荀子则侧重于外王之学，其贡献在礼的方面。由于对现实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以及在理论上有所偏重，所以荀子的“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的观点，已将“先富后教”修正为“富国裕民”、“礼义之化”。同时，也将孔孟的“民本”思想改变为“国本”以至“君本”了。

先秦儒家的孟荀学派，都认识到社会的组织和国家的成立的基本要素，对孔子“庶、富、教”的立国要素论及治国重在富民、教民的思想作了新的发挥。《孟子·尽心》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荀子·致士》也说：“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民，第三是法制，第四是君主的统治权。可见，“人民”在荀子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讲“天下兴亡系于‘民心’”，“人和”，讲“发政施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讲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在处理国家与人民、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上，立足点站在人民一边。荀子的治国方略，重点是如何协调、平衡国家、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强调的是“礼”与“人”不可分离的关系，即“礼之序也”。虽然他仍然保持着孔子、孟子“贵民”的传统，但鉴于急遽转变的政治现实和天下统一的大势，立足点开始转向于“国”或“人君”一边。他讲‘君者,民之原也’(《君道》),讲‘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论》),讲‘美政’、‘美天下之大本’(《富国》)及“君者,善群也”(《王制》)等等。

荀子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一再告诫统治者要“爱民”、“敬民”,因为立国的四大要素中,土地与人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强调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就是对统治者发出的忠告。基于这种认识，他启导统治者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王制》)把‘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三大纲领，既保留着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又显示了荀子针对新的形势而制定的治国方略的卓识远见。孟子虽然重视“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但也讲“广土众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尽心》)认为推行‘仁政’,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荀子则变通孔子“近者悦，远者来”之说，提出“以德兼人”的理论，说“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议兵》)因为‘因德兼人’,不仅是统治其人,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